

天主教在近代宜宾的传播述略

李玉芳,舒泽桃,李玉瑶

(宜宾学院,四川 宜宾 644000)

摘要:作为基督教重要教派之一的天主教,于康熙年间传入宜宾,随后逐渐在宜宾地区传播并发展,最终建立了川南(叙府)教区。本文主要从天主教传入宜宾、川南教区的设立、川南教区的组织机构及修院概况、川南教区的经济概况及“社会事业”等方面介绍近代宜宾天主教的情况。

关键词:近代宜宾;天主教;川南教区;传播

中图分类号:B977.7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5365(2007)10-0025-04

“四川天主教因活动历史长、教徒多、范围广、影响深,在全国天主教中有着突出的地位,颇有研究之价值。”^[1]有鉴于此,有多位学者致力于研究天主教在四川乃至全国的传播情况,并取得了比较丰硕的成果。专著方面,有周大良的《中国天主教》,晏可佳的《中国天主教》和《中国天主教简史》,顾裕禄的《中国天主教述评》等,这些专著均论及了天主教在近代中国的传播情况。另外,刘君的《清代四川外国教会述论》,冉光荣的《清前期天主教在川活动与清政府的查禁》,秦和平的《清代四川天主教拾遗》、《清代中叶四川官绅士民对天主教认识之认识》和《清代中叶四川天主教传播方式之认识》等,对天主教在四川的传播有所涉及。但对于四川天主教重要教区之一的川南教区(宜宾),则少有专门的论述。

本文吸收前辈学者的研究成果,梳理宜宾市档案馆、宜宾市地方志办公室等单位珍藏的相关资料,着重介绍天主教在宜宾(川南教区)的传播情况,以期有助于人们对近代宜宾天主教的认识。

一、天主教传入宜宾及川南教区的设立

17世纪40年代,天主教开始传入四川。初有法国耶稣会传教士利类思“前先入川,传扬福音”,继有葡萄牙传教士安文思由浙江来川,襄助传教事务。他们“不惟在成都宣讲福音,并且往保宁、顺庆等处虔救人灵”,结果“领圣洗者亦复不少”,揭开了近代四川天主教传播历史的第一页。^[2]其后,张献忠农民起义军入川,天主教活动大受摧残。顺治末年,许缙出任川东道,其母许徐氏随同前来。途经汉中时,许徐氏邀请传教士穆格我入川复振天主教。穆格我先后在重庆、阆中、成都等地建立教堂,竭力发展教务,一年内受洗者有600余人,影响深远。这时四川、云南、贵州、广西等省的天主教徒日渐增多,罗马教皇亚历山大七世就在上述各省建立了一个“代牧区”。此时川南宜宾是否已有天主教

徒,尚缺乏足够的证据。

康熙四十一年(1702),“法国巴黎外方传教会”会士穆天尺、白日升、梁弘仁等来川传教。白日升后奉命至川南发展教务,天主教遂传入宜宾。在“湖广填四川”的移民洪流中,也有部分天主教徒循金沙江迁徙到宜宾、康熙三十九至四十年,老教友骆良魏家、伍姓、王姓、马姓、宋姓等六家“来叙府住居”。^[3]^[6]宜宾城内信奉天主教最早的观音阁佑盛号吕家,便是在江西奉了教,后来迁入宜宾,经营药铺的,由其宣传联络,城内奉教者渐多。继白日升之后在宜宾一带传过教而有证可考者有法国人艾若望、刘翰墨、吴斯德望及中国神甫朱荣和梅安德勒。

乾隆初年,“吕已于教徒家举行宗教仪式”^[4]^[622]。乾隆四十五年(1780),为适应“礼仪之争”后的禁教环境,保存和发展教会的力量,传教士刘翰墨、艾若望在川滇交界的云南大关县龙台乡龙凤场(龙溪)建立修道院,培养中国籍神职人员。两年后,龙溪修院迁至宜宾县横江镇落壤沟(又名洛阳沟、落难沟)。落壤沟修院为中式瓦房六间,一字排列,依山而建,可培训修生20余人,院长是刘翰墨。嘉庆十七年(1812),常明任四川总督,因修院被人告发,清政府予以查封,传教士及部分修生逃往他处。修院在1803年就培训出中国神甫16名,在被毁的1814年已经祝圣了27名中国神甫,其中较有名的有袁在德(1782-1792年在修院)、刘翰佐(1808-1812年在修院)和刘达陡(1803-1804年在修院)等人。^[3]^[12]

第一次鸦片战争失败之后,清政府在法国的胁迫之下,同意弛禁天主教。不过,道光帝在弛禁令中明确规定“外国人概不准赴内地传教”。但许多传教士无视清帝禁令,潜入内地活动,促进了内地天主教势力的发展。

在1840年以前,四川主教区已开始建立,辖有四川、云南、贵州、西藏等广大地区。随着天主教势力在内地的的发展,不得不逐

收稿日期:2007-07-04

基金项目:宜宾学院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基督宗教在近代宜宾的传播及其影响的研究》(2007S03)

作者简介:李玉芳(1965-),女,四川荣县人,政治与公共管理学副教授,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史、中国宗教史研究;舒泽桃(1963-),女,四川泸州市人,政治与公共管理学副教授,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史研究;李玉瑶(1973-),女,四川宜宾人,外语学讲师,主要从事英语应用语言学研究。

渐分而治之。1840年8月28日,云南主教区建立,1846年3月27日,贵州主教区建立,西藏教区(拥有1200名教徒)仍由四川主教区管辖。1856年,四川主教区划分为川西北、川东南、西藏三个主教区,叙府(今宜宾)属川东南教区管辖。

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清政府被迫推行“保教”政策,加速了外国教会势力在四川的发展。咸丰十年(1860)1月24日,由川东南教区划出下川南,川西北教区划出上川南,合上下川南而成立川南教区,梵蒂冈教廷任命皮松为主教,主教驻地在叙府(宜宾)。川南教区所辖各县为宜宾县、庆符县、高县、筠连县、珙县、长宁县、兴文县、南溪县、江安县、纳溪县、泸州、叙永县、古宋县、古蔺县、富顺县、自流井、隆昌县、合江县、内江县、资中县、资阳县、嘉定、屏山县、马边县、雷波县、犍为县、荣县、威远县、井盐县、仁寿县、彭山县、眉州、青神县、夹江县、峨眉县、峨边县、洪雅县、浦江县、丹棱县、名山县、芦山县、雅州、荣经县、汉源县、建昌、冕宁县、盐源县、昭觉县、天全县、会理、盐边县等,共51县。川南教区南傍云贵教区,东临川东教区,北接川西教区,西接西藏教区,是中国西南地区的重要教区之一。1867年,皮松主教曾自得地说:“我的教区与四川另两个教区比较,其面积是同样宽广,人口也差不多是一样。”^[5]川南教区初建之时,主教住在宜宾城内拱星街一户教徒家里。同治九年(1870)左右,始在都长街购买民房,修建“永生公馆”,作为川南教区的大本营。修建“永生公馆”的费用,有一部分是向富裕教徒(如“佑盛号”吕家、“万和老窖”张家及“天成堂”陈家等)借贷而来的。光绪元年(1875),公馆落成,命名为“大法国巴黎外方传教会川南教区永生公馆”。

宣统二年(1910),川南教区分出建昌(即西昌)教区。民国十三年(1924),经梵蒂冈教廷传信部批准,改名为“叙府教区”,“永生公馆”也更名为“中国天主教叙府教区永生公馆主教公署”。民国十四年(1925),又分出雅州教区。民国三十年(1941),雅(安)、嘉(定)合并为嘉定教区。叙府教区所属仅余叙府、泸州、内江及自贡,遂于民国三十五年更名为“叙府主教区”。解放后,这个教区的神职人员及教徒自动改称为“宜宾教区”。

川南教区主要代表法国势力,主教都是法国人。第一任主教皮松,1860年-1871年主管川南教区共11年。第二任主教孟姓(佚名),1871-1886年控制川南教区共15年。第三任主教沙德勇,1887-1920年控制川南教区共33年。第四任主教刘若望,1920-1931年控制川南教区共11年。第五任主教唐嵩铎,1931-1942年控制叙府教区共11年。第六任主教林茂德,1946-1950年控制叙府教区共4年。解放后的第一任主教王炬光,于1958年2月1日被宜宾教区的爱国爱教的神职人员选出,同年12月21日被祝圣,宜宾教区摆脱了梵蒂冈的控制,走上了独立自主的道路。

二、天主教川南教区的组织机构及修院概况

天主教川南教区与其他教区一样,受到双重领导。从天主教会组织来讲,直接受梵蒂冈教廷的传信部控制,主教的选举祝圣,教区的划分、扩大或缩小、合并等必须由梵蒂冈教廷支配管理,每年年终必须呈报工作总结、各种报表及调查数字,教区主教除经常禀报请示外,每五年应到梵蒂冈“述职”一次。从传教士本身

来说,他们均属“巴黎外方传教会”,受法国所谓保教权的“保护”,因此,教区主教的确定,还必须得到巴黎“外方传教会”和法国政府的同意。主教除按时向“外方传教会”呈报有关文件外,每年还必须写几次“通讯”或“报告”之类的东西,主教到梵蒂冈“述职”之前或之后,也必须至巴黎汇报情况。四川各教区在1946年之前,在天主教组织的系统内,本名为“代牧区”,主教称“代牧”(即代表教皇管理教区)。1946年,中国的天主教成立了圣统制,才正式称为“叙府主教”或“宜宾主教”,不再受梵蒂冈教廷的委托。解放后,中国天主教会宣布同梵蒂冈教廷脱离关系,并组成爱国会。宜宾天主教会也随之成立爱国分会,从此走上自治、自传、自养的道路。

教区除设主教一名外,设有副主教一名,由主教遴选充任,协助主教办理教区行政事务,必要时代行主教职务。主教系终身制,除因重大特殊事故而被撤职外,在病老体弱时,可以向梵蒂冈申请由教区的全体神职人员选举一位神甫来做襄理主教。襄理主教与主教相同,要接受祝圣,神权与主教同,不过主教在世时他只能行使主教赋予他的职权,赋予多少,行使多少,不得逾越。教区的最高权力机构是教区咨议会,主教为议长。因此,教区内享有绝对职权的是主教,咨议会只对主教提供建议,最终决定权属于主教。咨议员由主教指定,任期不定,主教有权自由撤换。教区的经济负责人称为“当家神甫”,只能由传教士充任,教区内一切开支收入均经其手,权限极大。当家神甫是咨议员,与副主教一并为主教的左右手。主教区行的政系统,主教、襄理主教、副主教之下为本堂神甫,由传教士担任,负责一堂的宗教事务,管理教徒和财务。在中外神甫多的时候,大堂口一般还有副本堂,由中国神甫充任。本堂与副本堂之间差别极大,界限极严,因此,当副本堂的中国神甫往往牢骚满腹,自称为“当媳妇”。各堂都有男女布道员,协助本堂、副本堂搞教务活动,如办理对外文书,管理学生,教经文、教规、教义、数理等。在有本堂神甫的堂口,教徒中设有会长一人,由本堂指定或教友推荐,一般有钱有地位有威信而且信仰较虔诚的男教徒才符合当选条件。会长系义务职,任期不定,他只办理本堂交待的事务,可以调解教徒间或非教徒间的纠纷,本堂和副本堂不在的时候,他还可以付洗婴儿及病人。

川南教区刚成立时,全教区只有8个“传教士”和3个中国神甫,要在广袤达10多万平方公里的教区内开展教务工作非常困难。为了培养各级神职人员,教区创办了不同级别的修道院。教区成立之后不久(时间已不可考),就在宜宾县属白沙的石碑(今属黄桷坪乡)附近,买了关刀田一块田地,因陋就简地办了一所能容纳20人左右的修院,以培训中国神甫。该修院因光绪二年(1876)和光绪二十一年(1895)两次人民起义的毁坏而两次修葺,直到1897年建成了一个四合头砖木结构的一楼一底和部分二楼一底的中式房子,定名为“叙魂书院”。光绪二年(1876),在宜宾县天池侧面的小山上(小地名扇子田)修建了备修院,院名为“若瑟书院”,系一小四合头平房,要进修院的儿童须先在这里接受一至三年的培训。同年,还在今南广乡火地沟修建了一个综合性修院。光绪三十四年(1908),沙德勇创办“三德堂”。“三德”系指教会内的“三个基本道德”,“三德堂”的外名意即“教理

师资学堂”,顾名思义是专门培养经书传习所的师资的。1913年,沙德勇在嘉定建立童贞院,院长刘若望。1921年,童贞院迁至宜宾文星街,院长唐蔼铎。童贞院又叫训道修上院,主要培养女的教学辅助人员。1922年,在岷江北岸安阜镇侧面一块地皮上又盖起了一座一楼一底的洋房,取名为“奥斯定大修院”(据说,教徒宋光明曾捐了大笔款项来修盖这座修院,宋洗名奥斯定,故名此修院)。为了对教徒及其子女进行宗教教育,教区内各堂口都先后开办了一所乃至几所宗教课传习所,男女分开。1890年川南教区有68所,1946年宜宾教区就增办了100所。

各级修院(包括备修院在内)的院长在抗日战争胜利之前都是“传教士”。1946年,才有第一任中国人做小修院的院长。院长之下的神甫教师,清末民初皆系传教士,后来才有中国神甫。这些负责教读的人主要有四种:一是哲学毕业的大修生,二是童贞院贞女或已脱离童贞院的女教徒,三是“三德堂”毕业的学员,四是一般男女信徒,只要有一定文化水平和一般的天主教知识。他们只要品行好、态度好,在当地教徒中一般都有威信而受到教徒们的尊敬。备修院里每天上午两堂课,学习拉丁文和国文,下午学写中国字。小修院里每天四堂课,上午学拉丁文和国文,下午学中国史地和算术、代数、几何、三角等,毕业一般都是六年。大修院除院长外,只有一、二个法国人授课,开设有古典文学、哲学、神学、圣经、教会历史、教会法律等。童贞院的贞女们主要学习经文教理和缝纫刺绣手工等。“三德堂”主要的科目是宗教课,此外还设有国文和小儿科的基本知识。“三德堂”在1942年抗日战争警报频繁时期停办,停办时有学生22人。1949年解放前夕,各级修院均被时宜宾教区主教林茂德解散、关闭。

各级修院为川南教区培养出了大批的中国籍神职人员,这些国籍神职人员与外国传教士一起,积极努力地推动着天主教在川南的传播与发展。据《川南主教区基督教徒行政统计表》(1860-1910)统计,1861年天主教徒近1.2万人,大小教堂及祈祷所4处,宗教团体8822个;1880年天主教徒达到19937人,大小教堂及祈祷所32处,宗教团体达19068个。^[6]1901-1946年间,川南教区的人数又大有增加,除分出建昌(今西昌)教区和嘉定(今乐山)教区2万多名教徒以外,据教廷传信部1946年出版的“传信部所属传教区”第38页(转引自王炬光《中国天主教会——宜宾教区史》)提供的资料,可获如下一些数字:

教区辖区50000平方公里,总人口750万,教徒28625人,准教徒1893人,传教士26人,中国神甫36人,本堂33个,分堂52个,外国修道5人,中国修道45人,男布道员55人,女布道员5人,大修院1个修生15人,小修院1个修生34人,男教师(教经书)50人,女教师(教经书)80人,宗教传习所100个,男生1389人,女生1478人,医院1所,医生1人,护士(正式的)1人,病床80张,施药120866人次(实际病床只有30张左右——编者),女中学校一所学生132人,小学校一所男生339人,女生491人,三德堂一所学生22人,孤儿院一所男3人、女48人,孤老院6个,1226人。^{[3](20-22)}

另据《宜宾县志》载:1909年,宜宾县天主教徒已达5800人,辛亥革命后逐渐减少。1945年尚有教徒1041人。1949年回升

至2232人。时城区除公济堂外,有教堂3所,乡区有教堂9所。^{[4](623)}

三、川南教区的经济概况及“社会事业”

川南教区(包括后来的叙府教区)的经济来源,大致有以下几部分。一是“巴黎外方传教会”的拨款。川南教区属于该会,因此,在获得清政府大量赔款之前,大部分经费都来自该会。二是法国政府的津贴。法国政府经梵蒂冈教廷允许,从葡萄牙手中攫取了在中国的所谓“保教权”,其中的一个交换条件就是法国政府在经济上要解决中国天主教的各种需要。同时,法国传教士来中国常常有政治上的秘密任务,因此,法国政府更有责任拨给活动经费。三是梵蒂冈教廷的拨款。由于法国是一个外强中干的殖民主义国家,巴黎“外方传教会”的活动范围又遍及亚、非、美三大洲,其支付相当庞大,因此,法国政府和“外方传教会”拨付给川南教区的经费不能满足传教士在教区的经济需要,梵蒂冈教廷就按年汇款来适当弥补。“外方传教会”、法国政府和梵蒂冈教廷的汇款并非直接汇与川南教区,而是先汇至川南教区在香港的帐房,再由汇款单位及帐房通知川南教区,按规定手续去用。四是教徒个人捐款。个人捐款为数甚小,作用不大,不过也是教区的经费来源之一。五是法国传教士用各种卑鄙的手段弄得的一部分钱。西方国家对旧中国的贫穷落后了解得十分清楚,法国传教士就利用这一点向外要钱。他们要钱的花样很多,如拍摄照片(地质照片、地形照片、古董照片、军事照片、未成建筑物的照片、修院修生的照片、贫苦教徒和他们住处的照片等)寄送西方,给修生找“洋保保”,以“慈善事业”的名义和用投稿的方法等骗取布施要钱,这种款项为数也少,但也是教区经费来源之一。六是清王朝中央政府及地方政府的赔款。由于外国传教士横行不法,部分教徒依仗教会势力为非作歹,激起人民的反“洋教”斗争。而每次教案发生后,法国政府均胁迫清政府镇压人民并赔款。内江事件,据1876年10月法国里昂《传教周刊》载“清政府赔银数十万两”;沙德勇事件,据重庆海关(英)代理税务司华特森给海关总署(英)总税务司赫德的报告称“清政府付出赔款银七十五万两”;余栋臣事件,据1901年12月31日重庆海关(英)代理税务司华特森给海关总署(英)总税务司赫德的报告称:此次“费去四川省赔款银一百万两”。川南教区从这三次教案约分得的赔款银达100万两。^{[4](623-624)}1876年之前,川南教区在经济上可谓捉襟见肘(如前所述,1870年教会购买都长街一些民房修建“永生公馆”,就曾因经费不足而向富裕教徒吕家、张家和陈家借贷)。1876年之后,由于骗得巨额赔款,川南教区的经济状况大为改善,甚至走上了“富裕”之路。七是商业、高利贷剥削所得。“永生公馆”靠着赔款大买街房、田地,房租、田租成了后来“永生公馆”经常费用的主要来源。同时,利用赔款和房地产收益,先后为宜宾美纶商店、和通字号等提供贷款、汇兑,牟取高额利息,据《宜宾市志》载:“每汇银万元到上海,常赚取汇水16-34%,最高时达50%。”^{[7](701)}而《宜宾县志》载:“由宜宾汇1万元到上海,汇水最低一次在1932年,计1600元,最高一次在1934年,高达100%。”川南教区有了上述各项收入之后,变得十分富裕,修建了医院、学校、各地教堂。而且,至1949年,“永生

公馆”在香港外国银行的存款已有10多万港币、2万多美金；在法国商业实业银行有上百万法郎存款；在法国铁道企业有限公司及机器制造业、化学工业等企业也有几万至几十万法郎的投资。^{[4] (624)} 为了扩大影响，开拓传教之路，法国传教士在川南地区传播天主教的过程中，还举办了一些其他事业作为传教的辅助手段。首先，创办了医疗卫生事业。1904年，“永生公馆”聘请“方济各会”的修道在宜宾兴隆街开办了公信医院。该院至1935年从未聘请过正式医生，法国驻重庆炮舰队的医务人员酷暑时来宜宾小住，就到公信医院诊病，时人称为“法国医官”。医官不在时，任由“方济各会”的修道应付病人。1935年后，才开始聘请医师来医院工作。1933年，医院在状元街设一专为穷苦病人诊治、不收医药费的门诊部。1947年在东街又增设一门诊部。1948年在医院北侧扩建一楼一底的洋房为医院的门诊部，设有妇、内、外、儿科和化验室。1951年，医院为人民政府接收，更名为宜宾专区第一人民医院。^[6] 其次，兴办教育事业。1904年，为替“滇越”铁路培养一些翻译及所需之“人才”，“永生公馆”在城内大碑巷开办了一所中西学堂——“法文学堂”，广收士绅粮户子弟，教以法文和肤浅的科学。此学堂只办了四年就停了。1915年，创办公信小学，早期只收女生，1921年呈准教育部立案后，添办了男生部。学生人数最多时是1944—1949年期间，经常在1000人左右。学校的管理和学科的设置立案后均依教育部之规定，未设宗教科目，这与洋人创办之目的大相违背。该校前三位校长皆为外国人，1930年后依中国政府之规定改由中国人担任，1952年由宜宾市人民政府接管，改为兴隆街小学。1920年，“永生公馆”在一女子训练班的基础上于文星街创办了公信女子中学。初期只办初中，春季招生，三个班，学生常在100人以下。1941年开始秋季招生，六个班，学生在170人左右，1943年秋季办高中，1952年更名为“公信中学”，开始招男生，并被人民政府接收，改为“宜宾第七初级中学”。1946年，公信医院曾开办了护士训练班，学生半天上课，半天在病房工作，解放后该护士训练班与基督教华西浸礼办的仁德医院护士学校合并而成立宜宾护士学校。此外，1947年创办的“公信幼儿园”于1951年也被人民

府接收，更名为“打金街幼儿园”。再次，举办“救济”事业。“永生公馆”曾于1900年创办孤贫院二所，一所在北城边壕沟头，一所在西门外，收容教内外孤贫者，供给住宿。不过，孤贫院破烂得很，小雨小漏，大雨大漏，名为“漏棚”。尤其是北城边壕沟头的房子，坐落低地，雨稍大，屋上漏雨，屋下涉水，坐在床上，脚在水里。“永生公馆”及其所派管理人，却毫不加以修葺，卫安昌传教士还贪污专为救济孤贫之用的60石田租，并对无处可去的孤贫者怒骂暴打，非常残暴。1952年，孤贫院被人民政府接收，在真武山脚下新建了宿舍，并为有劳动力者安排了工作。1947年，“永生公馆”将原在泸县宝艾寺天主堂内的儿童院迁至宜宾拱星街，曾收容教内外弃婴及贫苦无法抚养的子女30余人，并对他们实行宗教教育，使其领洗奉教。1951年，被人民政府接收，并入宜宾市生产教养院。1894年创办的泸州孤贫所，也于1952年被人民政府接收。

医疗、教育、“救济”事业，是外国宗教侵略的一部分。但从客观上来说，也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一是弥补了当时中医的某些不足，并使下层穷苦百姓有了一些看病治病的机会，使孤贫者有了落脚之处；二是办学、办医院过程中，也传播了西方医疗卫生和文化教育等方面的知识，促进了新教育的发轫、民智的开通和社会的进步。

参考文献：

- [1] 秦和平. 清代中叶四川官绅士民对天主教认识之认识[J]. 宗教学研究, 2000, (1).
- [2] 古洛东. 圣人入川记[M]. 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1. 1-5.
- [3] 王炬光. 中国天主教会——宜宾教区史[M]. 宜宾市档案馆藏资料.
- [4] 宜宾县志办. 宜宾县志[Z]. 成都: 巴蜀书社, 1991.
- [5] 刘君. 清代四川外国教会述论[J]. 北京: 历史档案, 2002, (4).
- [6] 魏瀛涛, 王笛. 西方宗教势力在长江上游地区的拓展[J]. 历史研究, 1991, (3).
- [7] 宜宾市志办. 宜宾市志[Z]. 北京: 新华出版社, 1992.
- [8] 宜宾市第一人民医院院志(略稿), 1-4.

The Spread of Catholicism in Modern Yibin

Li Yu - fang, SHU Ze - tao, Li Yu - yao
(Yibin University, Yibin 644000, China)

Abstract: Catholicism, an important sect of Christianity, was introduced into Yibin during the reign of Emperor Kangxi. And its successful spread in the district resulted in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Diocese of Southern Sichuan. This article presents a survey of Catholicism in modern Yibin, including its introduction into Yibin, the setup of the Diocese of Southern Sichuan, the organization of the Diocese of Southern Sichuan, the churches in this diocese, its economy and public services the churches undertaken.

Key words: Modern Yibin; Catholicism; Diocese of Southern Sichuan; Spread

天主教在近代宜宾的传播述略

作者: [李玉芳](#), [舒泽桃](#), [李玉瑶](#), [LI Yu-fang](#), [SHU Ze-tao](#), [LI Yu-yao](#)
作者单位: [宜宾学院, 四川, 宜宾, 644000](#)
刊名: [宜宾学院学报](#)
英文刊名: [JOURNAL OF YIBIN UNIVERSITY](#)
年, 卷(期): 2007, 7(10)
被引用次数: 0次

参考文献(8条)

1. [秦和平](#) 清代中叶四川官绅士民对天主教认识之认识[期刊论文]-[宗教学研究](#) 2000(01)
2. [古洛东](#) [圣教入川记](#) 1981
3. [王炬光](#) [中国天主教会—宜宾教区史](#)
4. [宜宾县志办](#) [宜宾县志](#) 1991
5. [刘君](#) 清代四川外国教会述论[期刊论文]-[北京:历史档案](#) 2002(04)
6. [魏瀛涛](#), [王笛](#) [西方宗教势力在长江上游地区的拓展](#) 1991(03)
7. [宜宾市志办](#) [宜宾市志](#) 1992
8. [宜宾市第一人民医院院志\(略稿\)](#)

相似文献(1条)

1. 学位论文 [何畅](#) [宜宾教区近代天主教堂建筑研究](#) 2006

最早在四川建筑的近代外国建筑是天主教堂,对川南宜宾教区天主教堂的研究揭示了西方宗教文化和建筑文化在宜宾教区的传播,为我们研究东西方建筑文化的交流提供了重要的思考,对研究川南宜宾教区近代建筑的演变亦也重要的参考价值。

本文对川南宜宾教区的近代天主教堂建筑的社会历史背景、发展状况、分布特点、建筑造型风格特点和建筑成就作了较系统的调查研究和分析,由此展示出宜宾教区近代天主教堂作为西方建筑文化的一部分在这一教区的发展和演变,产生出丰富多样的建筑形态,成为宜宾教区近代建筑文化遗产中具有相当价值的组成部分。作者实地调查了宜宾教区现存的全部天主教堂,收集一手资料,对其进行了分析,对比和评价,得出以下结论:

天主教堂作为近代宜宾地区最早出现的欧洲建筑类型,仍然保留着西方教堂的痕迹。由于具体的地理位置、特定的民族文化和独特的历史背景与地方传统紧密相连,近代宜宾教区天主教堂建筑突破了原有的欧洲教堂模式,逐步地将地方传统建筑形式融入教堂建筑模式中,发展演变为独特的、中西合璧的地方教堂型制。

近代宜宾教区天主教堂经历了礼仪之争、欧洲政教分离和地方社会复杂纷繁的历史变化,充满矛盾与冲突的中西文化交流导致宜宾教区天主教堂建筑变化的不稳定性,最终未能形成相对成熟的新的建筑形式,而只能停滞在朴素的折衷主义状态。

这些教堂建筑的出现,丰富了我国的建筑历史和文化和城市景观。作为多元建筑文化中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些建筑应该得到合理的关注和保护。

本文链接: http://d.g.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ybxyxb200710008.aspx

授权使用: 广东商学院图书馆(gdsxy), 授权号: 97f4f578-48b7-406a-9d29-9e4d0071cf61

下载时间: 2010年12月15日